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吴海民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中国敏感地带_(一)

吴海民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成都

目 录

第一部新闻警示录	(1)
引子	(1)
中国记者,道德危机出现了吗?	(3)
新闻生命的自戕	(18)
新闻界十载困惑	(36)
记者,使命与彷徨	(54)
传媒“下海”的误区	(67)
新民谣与自画像	(84)
尾章新闻自律浪潮	(100)
第二部书号“魔方”	(105)
一、神圣扫地	(105)
二、“潘多拉魔盒”打开了	(116)
三、怪胎	(140)
四、“灵魂工程师”的灵魂	(164)
五、并非“诺亚方舟”	(177)

六、禁与不禁	(199)
第三部走向伯尔尼	(215)
引子	(215)
第一章 权利的正名	(217)
第二章 我创造 我拥有	(233)
第三章 大写的人	(250)
第四章 中国,别无选择	(267)
第五章 国际标准	(283)
第四部大陆音像圈	(301)
序章 站在音像圈上眺望	(301)
第一章 美妙的音像	(303)
第二章 倾斜的音像	(312)
第三章 肮脏的音像	(321)
第四章 迷途的音像	(332)
第五章 饥渴的音像	(339)
第六章 觉醒的音像	(346)
尾章 站在音像圈上沉思	(354)
第五部发烧的魔碟	(356)
引子	(356)
一、仿佛是谁使了魔法	(357)
二、饶昏了头的市场	(359)
三、进行“国际大转移”的投机商	(363)
四、唱片生产线引进热	(364)

五、谁来驾驭这股热流	(367)
不是尾声	(369)

第六部扫黄的困惑 (371)

总书记发怒了。省委书记们也发怒了。领导人微 服私访暗查色情动向。扫黄开了杀戒	(371)
只身一人对全国重点地区进行调查。比较保守的 估计：非法出版物占 60%以上。到处黄潮滚滚。 最流行的字眼是：性、欲、肉、奸、淫	(378)
《少女之心》拉开了淫秽图书的序幕。“黄色幼童” 不肯呆在纽约东区。中国人的“无性时代”	(384)
1989 年的扫黄可以称为一场风暴。内地大清查。 沿海大围剿。现在还不是庆祝胜利的时候	(392)
全国范围的黄色浊流大“回潮”。扫黄总指挥们 的困惑。扫黄、打非斗争成了旷日持久的“拉 锯战”	(401)
一只被剥了皮的死猫挂在管理干部的门上。匕首 下的纸条写着：“你再管市场，就不客气了！”	(410)
罪犯预付的“风险抵押金”。来自湖南的反复说 明了什么。“老子有钱，谁也拿我没办法。”	(418)
许多案件都这么拖着。有案不立、有罪不究、重 罪轻判的问题大量存在	(426)
体制不顺是绕不开的问题。书刊的“高位截瘫”。 音像的“三国演义”。印刷的“八国联军”	(432)
省委宣传部长被扣留事件令人瞠目。经委主任的 口吻像是在发出威胁。是谁撑开了这把“保护	

伞”?	(437)
关于扫黄的奇谈怪论。繁荣“娼”盛?越扫越黄?	
我们会付出道德沦丧的代价吗?	(445)
后 记	(453)

新闻警示录

引 子

写这部作品的念头,是在中南海开会那一天萌生并强烈起来的。那天是1993年8月10日,首都各主要新闻单位的负责人聚集到中南海,集中讨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这个重大课题。由于我在这之前刚刚连续发表了《有偿新闻困扰新闻界》的系列报道,作为一名普通记者,被特邀参加了这天的会议。

会址不是通常举行会议的怀仁堂,而是在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驻地。这似乎有一些象征意义。在中国,会址往往反映着会议的规格。在中南海举行的会议当然是最重要的会议,而在中央领导同志办公驻地举行的会议则反映了它具有更实质性的工作意义,会议的气氛是严肃的,因为它有一个相当严肃的议题。新闻界的这些首脑们绝不像平时研究一般报道时那么轻松。因为今天要把矛头对准新闻界自身的腐败现象,具体说,是有偿新闻这样一个“怪胎”。一段时间以来,有偿新闻问题已经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一向以批评社会各种丑恶现象为己任的新闻界,突然

发现自身正受到社会的道德审判；一向善于追踪和反映各种社会热点的记者们，突然发现自身陷入了社会热点之中。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新闻记者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道德危机。

那么，今天的会议应当对此有个“说法”了。这“说法”，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的讲话，和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

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新华社社长郭超人、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等，在会上作了有充分准备的发言。可以说，他们是代表中国新闻界对有偿新闻作火力集中的声讨，同时又是代表各主要新闻单位作一次十分郑重的表态。置身在会议严肃而郑重的气氛中，使我加深了一种感觉，这就是，中国新闻界正在以整体的名义向有偿新闻开战，并把新闻道德自律这样一个重大课题真正摆上了新闻界的议事日程。

散会以后，一辆辆轿车从东门鱼贯而出，中南海顿时恢复了平日的宁静，我是骑自行车进来的，这时候又骑上车子准备从西门或北门出去。沿着湖畔小道骑了一程，索性下了车，直走到中南海岸边，驻足观赏周围的景色。这里的景色美丽极了，空气清新极了，但这清新的自然空气中，又使人依稀可闻无处不在弥漫着的浓郁的政治空气，这似乎就构成了中南海的一种特有氛围。

在这样的氛围中，很自然地，我把新闻界发生的事情放在全国的政治大背景中进行思索。中国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深入的反腐败斗争风暴，而新闻界的这次行动，应当说是全国总体行动的一个前奏。新闻界能够先行一步，正好说明了新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新闻界的健康，将能够保障社会的健康；而新闻界的腐败，则会加速社会的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界

对有偿新闻等腐败现象的斗争,就具有了全局性的影响。

中南海的景色是怡人的,一旦站在这里,却又少了许多闲情逸致,许许多多严肃的沉重的问题都一股脑在脑子里涌现。

中国记者,道德危机出现了吗?

1993年入夏以后,海外一些传媒集中火力,对中国新闻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多见的,以往也有对中国新闻界的指责,但都是在政治方面,而这一次的火力集中在经济问题上,集中在新闻和金钱的交易上,而这正是中国新闻界最要命的地方。

我们被人家提起了一只“不开的壶”。

首先阿中国记者发难的,是纽约出版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该报于1993年4月23日发表一篇题为《大陆记者发财有术》的署名文章,作者肃然被介绍为“原服务新闻界,现为自由撰稿人”,这位先生说,他有一大堆记者朋友,原本有事无事的经常聚一聚,这两年劳燕分飞,各忙各的,以前那种推心置腹的机会反而少了。如今再见这帮朋友,大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为什么呢?他说——

“全是商人气派。或津津乐道炒股票如何发财,或谋划起公关公司拉广告,或大谈稿子的‘含金量’,在报上为企业发一篇东西该拿多少钱。据说有的企业明码标价,一个字一块钱……据圈子人透露,目前大陆企业开新闻发布会,请记者介绍自己的产品,标准价格是每位记者二百元至三百元红包,外带赠送产品或一顿宴席,就这样还有记者连吃带拿不干活的……组织这类新闻发布的广告公司或‘穴头’拿的钱更多。”

肃然感慨说：“大陆报纸版面不知有多少被记者私下瓜分了。在新闻界、企业界和读者、观众之间，这已是心照不宣的事，一见到剪彩、验收、鉴定等等需要公关的活动，不用问，必有幕后交易。……像这样不论三七二十一。拿新闻像卖猪肉似的换钱的做法，在全世界恐怕不多见。”

此后，1993年5月10日的香港《联合报》，也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题目是：《记者不耐清贫金元新闻风行大陆》。比起《世界日报》的文章来，这篇文章少了一些嘲讽，多了一些实在的内容，惟其内容较为实在，就更令人读了以后为之感到震惊。

文章披露说：“记者出场，参加各行各业的会议。必须向其支付‘出场费’，开始是有钱的企业，向出场的记者发‘红包’，现在发展到党、政、文、体，包括‘穷得叮当’的教育界，凡请记者与会，都无一例外地要付‘出场费’，‘出场费’以礼券(代币购物券)或现金支付，少则每人200元，多则500元，上海近年发放礼券13亿元，其中估计有数千万元落入记者之手，4月中旬国务院急令限期使用礼券到4月30日之后，记者们成群结队到商店开后门以礼券兑换现金，多者竟有上万。记者们发表有关企业、机关的稿件，除了在报社电台领取稿费之外，‘大头’是向所报道的单位领取10倍于此的‘稿酬’，而且近乎明码标价，一般的开张新闻，一二百字的短讯，支付记者一份，外加编辑一份，每份在200—400元之间，如果是消息、通讯、特写、专访，则在千元左右，至于那些数千字的专稿、长稿，已经有向记者支付万元大额的……一位前某报总编辑(这里略去姓名)近日作一诗讽刺这种‘有偿新闻’现象，可谓栩栩如生：‘有的老记本领高，不正之风大胆搞，新闻发布按惯例，吃罢佳肴收红包。厂家产品当试用，笑纳礼物岂能少。拿出版面作交易，张口伸手要酬劳，有偿报道

一挥就,论行计价算公道,不给好处不动笔,千把块钱一篇稿。职业道德全不顾,能多捞时便多捞。”

文章还指出:“更大的贿赂,还在于不少厂商在媒体养了各自的‘代言人’,将这些老记作为本企业的编外员工,对他们包吃、包行(所有交通费、通讯费一律报销)、包住(负担住房装修,甚至分房给老记)、包旅游(一年给数次全家免费旅行,现已发展到负担老记赴美、日、东南亚旅游票),甚至包子女的就学费用,老记们则‘士为花钱者死’,尽心竭力为企业宣传。”

文章最后说:“新闻行风日下。金元新闻风行,已经尽人皆知,当局三令五申,公众呼吁连连,但究竟会走到何种地步,多数的人,只有表示悲观。”

从春季到夏季,海外传媒对大陆新闻界议论纷纷,喋喋不休。

不知道记者们读了这些报道会有什么感觉。作为一名大陆记者,我读过之后脸上热辣辣地发烧。

国内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界人士,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看法(真实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在任何公开的社交场合,根本就捕捉不到,记者们听到的好话太多了,但在恭维者的内心深处,可能是在暗暗责骂呢!

我很想听一听企业家们是怎样骂我们这些记者的。为此,我曾联系采访北京亚都公司的总经理何鲁敏,我听说,亚都曾经受到某些新闻报道的伤害,对某些记者的行为大为恼火,并向中央新闻主管部门的同志递交过一份长长的材料,反映了新闻记者的种种不良行为,但是,要采访何鲁敏却很难。我按照何鲁敏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联系,一位不肯告诉姓名的男士回答说,何总很忙,此时不在,请先与公关部的小姐联系。我按照他提供的电话号码找到公关小姐,小姐告诉我下午回话,并要了我的电话

号码。但是,下午没有回话,第二天没有回话,第三天仍没有回话,我再用原先的电话号码与亚都联系,对方回答说不知道有联系采访这回事,也不知道先前那位答应回话的小姐是谁。我就反复解释说,我只是想听一听亚都对记者的意见、批评、听一听企业界对有偿新闻的反映,但我的这番解释很可能加重了亚都的顾虑。显然,他们并不愿意得罪新闻界。

我后来还是看到了亚都递交给新闻主管部门的那份长长的材料,上面详细地谈到了对新闻界的看法,记载了一串长长的拉广告要赞助者的名单,提到了一些侵占企业利益的记者的名字,并附着几份对企业具有伤害性的新闻报道。其中谈到,1993年4月28日一天,就有33家单位、团体、个人到亚都拉赞助,其中三分之一是新闻单位。这种情况是经常性的,如满足拉赞助者的需要,亚都平均每天就需支付50万元,一年下来就是1.5亿,而企业的产值才刚过亿,仅1992年一年,亚都为无端的理由就花掉了300万元。其中还指名道姓地谈到,某电视台经济部xxx曾拿着上万元的发票到亚都要求报销,材料中说:“我们感到新闻单位把生存寄托在企业身上。这是不对的。”

这份材料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我不但惊异于一些新闻单位和新闻记者的贪欲,而且惊异于亚都公司的有心和精细。他们竟然认真地记载并保留着一本明细的“帐簿”。当哪个新闻单位拉走一笔赞助费的时候、当哪个新闻记者报销了一笔企业额外开支的时候,他们的名字、款项的数额、交割的日期等等,便都一清二楚地记在那本“帐”上了。当哪个记者发表虚假报道的时候,当哪个报纸的报道伤害了企业的时候,这些白纸黑字就被剪贴下来附在那本“帐”了,如果将这笔帐目公之于社会,那该会形成多么大的震动!

但是,亚都不让将这份材料公开,甚至不让将这份材料转到第二个人手中。

亚都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才递交这份材料的,当时,由中宣部、中国记协和新闻出版署组成专访组,就纠正新闻行业不正之风问题走访北京的11家企业。亚都说:如果不是中央机关的同志来,我们是不会反映这些情况的。

亚都的这种顾虑在企业中带有普遍性。专访组在与牡丹集团、计算机二厂、民政工业公司、一轻工业总公司接触的过程中,明显感到他们对新闻界的心态可归纳为:“离不开,怕得罪,有意见”。二轻工业总公司就是以此为理由,拒绝接待专访组去调查。

不过,还是有企业坦率地反映了情况:

“这五年送给记者的东西档次越来越高。从笔、本、包,再到工艺品,再到工作餐加礼品,现在发展到工作餐加红包。”

“有的记者一天跑好几个单位,光收的纪念品就可用车拉。”

“某报与内蒙外贸局联合举办边贸洽谈会,全国各地150个厂家、600人参加了洽谈会,组织者共收摊位费等500万元,可150个厂家连一个外商也未接触到。由于大家强烈不满,两个记者才组织了一次与外商见面的茶话会,但没谈成一笔买卖。”

“丰台民政局曾与某报一位记者商量安排一些新闻单位采访,由于领导不同意而被取消,记者竟以‘已通知有关新闻单位为由’,强行索要了800元。”

“百灵无线电厂厂长给记者塞红包,记者在报道中把他吹成‘焦裕禄式的干部’。蒙蔽了不少人,实际上他把企业搞得一团糟,现已被罢官。……”

专访组请丰台区宣传部长安排到该区的乡镇企业去调查,部长干脆说:“你们不用去了,乡镇企业对你们这个题目不感兴趣,

我们都很清楚，谁肯花钱，谁的上稿率就高，乡镇企业认为，新闻界与企业之间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他还说：“乡镇企业没有正常的宣传报道渠道，不这样办，谁来宣传乡镇企业？”

如果说专访组的印象只是自上而下有目的调查的结果，那么下面这两封群众来信，则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社会反映。我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看到这两封信的：

来信一：

目前有些记者在采访报道中搞不正之风，已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表现如下：

一、热衷于到处吃喝，强行要企业给他们报销各种车费、餐费。

二、热衷于参加“新闻发布会”，或不邀而至，或一张请柬带三四人、五六人不等，或同一单位来几批，目的是捞钱捞物。

三、眼睛盯着广告、回扣，是否报道以有没有广告为标准。对拒绝给拉广告的，即使再有报道价值也不屑一顾。所谓有广告就有得“倾”，无广告就无得“倾”。而有的报社以高达30%的佣金回扣给记者，客观上又刺激了这种不良倾向的发展，广州有些记者已成了十万元以上的大户了。

四、强索“报道费”、“采访费”，一条新闻开价几百几千乃至几万元不等，如不给则不予报道。

以上事实广州各新闻单位都有存在，尤以小报、经济报纸、电视台、中央驻穗新闻单位等为最，这些情况仅供参考，请上级组织严加查处，以减轻企业负担。

省内一批中小企业

来信二：

新闻队伍必须纯洁清正，但目前新闻界很乱，声誉欠佳，“防火防盗防记者”这句话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有的记者乱捞乱取，有的记者打着各种旗号到处撞骗，有的记者在钱物的贿赂下充当别人的代言人，等等。如果长此下去，恐怕新闻界只会给社会进步带来损害，而不是充当社会进步的号手了。

广角镜读者

“防火防盗防记者”——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社会性传言啊，记者与火灾、盗贼一道，并列为社会公害！还有些说法比这更难听，如“金元记者”、“乞丐记者”、“豺狼虎报”、“两霸一报”、“一条狼、两只狗，外加记者一双手”……

面对海外舆论的挖苦嘲讽和社会各界的尖锐批评，新闻界的许多同志再也坐不住了。

这时候出现了“上书中央”事件，即一批已经退下新闻岗位的老同志联合签名，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递交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痛陈有偿新闻的种种表现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

我是在一次会议的内部情况传达时第一次听到这封信的内容的。传达时没有透露具体签名者的名字。后来我看到了这封信的文字稿，上面仍然没有具体署名，落款是：《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编辑部的一批老同志。文字稿显然经过了删节，其中曾谈到的一些具体事件及新闻单位的名字均被略去。尽管如此，这封信

仍然保留了深恶痛绝的态度和咄咄逼人的锋芒。

这封信说：“有偿新闻正严重地腐蚀着我们在长期战斗中培养起来的新闻队伍，败坏着我国有光荣传统的新闻事业的声誉。‘有偿新闻’不但已经成为海外新闻界对我们讽刺、挖苦的笑料、丑闻，而且长此下去我国广大人民将不再相信党的新闻事业，其最终结果是党的威信丧失，过去我们长期与之斗争的‘假大空’现象，主要是受‘左’的思想的影响。而‘有偿新闻’的出现和泛滥，则说明我们的新闻事业正在滑向‘拜金主义’的泥沼……我们虽然都是已经离退休下来的老兵，但不能眼看我们长期奋斗的事业遭到败坏而无动于衷。……”

“如果钱可以指挥新闻瞎吹瞎编，就无人相信新闻，新闻的生命也就完了。在‘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闻媒介，都把新闻真实性（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看成是维护自己声誉的大事，我们又怎能因钱而出卖自己的生命、自毁长城呢？……”

这封信的分量是相当重的，特别是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中，具有一种震聋发聩的力量，这是由新闻界内部人士掷出的一枚“重磅炸弹”。

扔这枚“重磅炸弹”的老同志是哪几位呢？后来我打听到，他们中有钟沛璋、戴邦等。

我是在一次新闻工作会议上认识钟沛璋的，我说希望能跟他深谈一次，他说要说的话其实都已经写进信里了。不过他没有拒绝，具体时间要用电话再联系一次，初步订在下周他的家里。

几天后我挂通了钟沛璋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夫人，她不把话筒转给钟沛璋，对我说她不同意老钟接受采访，她说：我们都是退下岗位的人了，不该再多管人家的事，你去找那些在职的吧，找某某报的某某，某某台的某某，还有某某报的某某，他

们了解的情况更多更具体,也更有发言权。

后来我又去一次电话,她还是婉言谢绝,再去电话,她说老钟要去南方了,要走很久。

戴邦则是十分爽快的。这位原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副所长,拄着拐杖把我迎进家里,又拄着拐杖从厨房提来暖瓶为我沏上茶,然后就直奔主题,严厉地抨击有偿新闻,他说,为什么目前新闻界的声誉不好、形象难看?有偿新闻对队伍的腐蚀相当厉害。拜金主义在社会上无孔不入,这当然不应由新闻界来负责任,但新闻界起到了很坏的作用。有些记者参与经济犯罪,帮助罪犯诈骗,这是记者的耻辱,是新闻界的耻辱……

谈到那封信,戴邦说,他当时看到香港的《联合报》那篇讽刺大陆新闻界的报道,就给钟沛璋打了一个电话,认为对这个问题应当表态,当时他们正合作编写《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参加编写这本书的都是新闻界的老兵,除了钟沛璋和戴邦,还有庄重、梅占益、阎玉、施强、周雨、徐熊等,他们传阅了香港《联合报》的那篇文章,汇集从各个渠道得到的消息,一起议论新闻界的现状,觉得作为新闻界的老同志在这样紧迫的问题面前不应当保持沉默。钟沛璋执笔将大家的意见写成信件,然后十位老同志又认真负责地讨论修改,最后每个人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姓名。戴邦对我说,这封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曾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读过,一位领导同志还打电话给钟沛璋,希望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后来我还是登门拜访了钟沛璋,钟沛璋说,这封信是他自己送到中宣部新闻局的,并请新闻局转给中央领导同志。他去新闻局那天正好看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领导同志是在看到外电报道后颇感吃惊才写下批示的。钟沛璋说:“这说明我们老同志与